加强学习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路径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明确指出，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并进一步提出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加强学习、要坚持和创新党内学习制度等具体要求。这些要求表明加强学习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一条基本路径。

    一

　　建党初期，党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大量入党的情况下，如何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党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要求通过学习教育，肃清党内各种错误偏向，“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92页）这就明确了党员加强学习的重要性和学习教育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开启了思想建党的新路，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党员思想教育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提供了有效路径。

　　在思想建党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延安整风等一次又一次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高潮，锻造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的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96年的历史，就是在不断探索思想建党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日益成熟壮大起来的。回顾我党96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质就是一部探索、实践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历史。什么时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且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指导实践，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否则，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课题和任务，加强理论武装永远在路上。必须清醒看到，党员思想问题不是一劳永逸、毕其功于一役就能解决的。在新形势下，一些党员、干部出现了理想信念不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动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缺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缺乏等思想问题，严重侵蚀了党团结统一的思想根基。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党员、干部出现理想信念迷失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在理论武装上出了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没有静下心来下苦功夫硬功夫真学真懂，对理论浅尝辄止，一知半解，因而在各种思潮纷纭而至的时候无法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于是，坚定的理想信念也就无从谈起。我们只有加强学习，进一步深刻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先进性、实践性，才能深刻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从根本上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坚定的理想信念主要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认同。因此，就需要坚持不懈地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尤其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学习好遵守好党章党规党纪，是加强学习、坚定信念的应有之义。理想信念虽属于精神层次，但却是可以检验的，是能够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在自觉地遵守党规党纪上。坚定的理想信念是自觉遵守党规党纪的前提，自觉遵守党规党纪是坚定理想信念的外在表现，二者高度一致、内在统一。全党要在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党章党规，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真正做到在思想上高度清醒、在政治上坚定自觉、在纪律上严守红线。

    二

　　加强理论武装，既是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又需要党组织加强引导、提供条件、督导检验。当前，一些党组织在抓理论武装的过程中，存在着形式主义问题。开会时看“出勤”不看效果，习惯于念报纸、读文件，照本宣科走过场，不能充分发挥党员在学习中的主体性、参与性和积极性，不能有效地把学习的过程变为党员提高理论修养、改造主观世界、坚定理想信念的过程，使本应严肃紧张生动活泼的学习变成了没有目的、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习，为学习而学习。这样的学习，时间长了，党员、干部也会失去兴趣，甚至会产生逆反和排斥心理。实际上，学习的关键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在于通过改造主观世界进而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

　　今天，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环境与革命时期有着极大的区别，影响和冲击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各种因素更加复杂。这就迫切需要党组织坚持不懈抓学习、党员要持之以恒终身学习。而这一切都必须靠系统的制度来保证。为此，《准则》提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督促检查，把学习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健全党内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分析研究和情况通报制度等，实现党员学习的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

　　一是以明确的责任机制保证党员、干部的学习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提出，“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要进行相关的问责。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自觉担当起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责任，建立教育效果的定期调研和分析制度，增强学习的计划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保证党员、干部能高质量地完成每年的学习任务。

　　二是以严格的学习考核机制激发党员、干部自觉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健全党员、干部学习计划、学习考勤、学习档案、学习通报等学习考核制度，把学习考核情况作为民主评议党员、综合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还要把学习考核情况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结合起来，使党员、干部的学习由“无指标”“软指标”变成可操作的“有指标”“硬指标”，真正把学习型干部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有效激发党员、干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在全党形成爱学习、善学习的良好风气。

　　三是以建立党内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分析研究和情况通报制度帮助党员、干部站稳政治立场。党组织要善于从党员的各种议论、意见和反映中，及时、敏锐地捕捉到党员思想中存在的各种正确的或错误的、主流的或非主流的、疑点、难点、热点和焦点问题。对党员的思想动态和深层次理论问题的认识要有整体把握，尤其对落后的思想、错误的观念、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要高度警觉，并对其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判断，有针对性地帮助党员、干部厚植先进的思想和正确的观念。把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讲清楚、讲透彻，帮助党员、干部分清是非界限，坚决抵制错误思想侵蚀，始终站稳政治立场。另外，各项学习制度还要和党内其他制度相结合，特别是要按照《准则》的要求，完善党内民主制度等，培育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调动党员、干部想学习、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习对于坚定理想信念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来源：《红旗文稿》2017/12　　作者：霍毅斌 山西省委党校副教授）

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为做好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指明了行动方向。新时期新形势下，深入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需要牢固树立“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紧紧围绕“谁来抓、抓什么、怎么抓”问题，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全面提升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水平。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责任**

这些年，高校总体保持和谐稳定，思想政治工作功不可没。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付；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提高政治站位，腰杆硬、底气足地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切实履行政治责任。

一是增强政治意识，把牢办学正确方向。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高校党委要从推进伟大事业、建设伟大工程、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和把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极端重要性，破除“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思想，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不懈促进高校和谐稳定，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确保学校办学的正确方向。

二是增强阵地意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大局有着重要的影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武装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增强“四个自信”，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对高校课堂、讲座、论坛、报告会、研讨会和互联网等阵地的管理，依法管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高校的活动，防范校园传教，防范敌对势力渗透，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三是增强育人意识，落实立德树人任务。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必须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高校党委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把人才培养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努力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切实解决重教书轻育人、重智育轻德育、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

**强化问题导向，加强工作统筹**

马克思指出：“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针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加强统筹和协调，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提升。

一是统筹教师和学生两大群体。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既要着眼学生，又要关照教师，教师和学生两大群体既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又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相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而言，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是薄弱环节。高校要统筹抓好教师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既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努力成为党和人民需要的栋梁之材，又要引导广大教师坚持教书和育人、言传和身教、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二是统筹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其他课程两大渠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主渠道，在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要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统筹教师、教材、教学各环节，提升队伍素质，更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把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系统教学与专题教育、理论灌输与实践研讨结合起来，努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针对性和感染力。同时，要加强其他课堂的教学，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相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高校其他课堂存在育人功能弱化的问题。要统筹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其他课程，明确所有课堂都有育人功能，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三是统筹文化育人与实践育人两大环节。针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存在的文化育人、实践育人相对薄弱，体系化、规范化不够的问题，加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把文化育人和实践育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年度工作计划。重视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培养大学精神，结合学校的校训校情、办学宗旨、历史传承，营造高雅校园文化，培育校园文化品牌，美化校园环境，丰富学生艺术活动，弘扬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学生的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重视和加强实践育人，把实践教学纳入教学计划，规定相应学时学分，合理增加实践课时。要抓住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要节庆日等契机和暑假、寒假时期，广泛开展特色鲜明的主题实践活动。加强实践基地建设，采取校企联合、校地联合等方式建立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基地。

**健全体制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进一步健全完善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各方面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一是党政共同负责，做好统筹协调。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结合高校办学实际，出台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细则和办法，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纳入整体战略规划中来通盘考量，制定行动方案，编制任务分解书、工作路线图。高校党委担负思想政治工作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校长在党委领导下组织实施党委有关决议，班子其他成员结合业务分工抓好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构建大思政格局，推进协同育人。改进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必须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宣传部门牵头协调，相关部门多方参与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思政格局，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完善的体制机制。学校党政工作各级部门要着眼大局、勇于担当、明确责任，将思想政治工作嵌入日常的工作中去，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三是加强支部建设，发挥堡垒作用。高校支部是党在高校的战斗堡垒，担负着直接联系、引导、组织和团结师生的重要职责。要狠抓支部建设，在打牢基础、补齐短板上下功夫，打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最后一公里”。对于教师党支部，要在坚持按院系内教学科研机构设置的基础上，探索党组织进项目组、课题组，实现组织设置以行政组织为依托和以学术组织为依托并重。对于学生党支部，要在坚持按年级或院系设置的基础上，探索党组织进学生公寓、进学生社区、进学生社团，实现党组织全覆盖。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两学一做”为基本内容，以“三会一课”为基本制度，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激活党支部主体作用。

四是强化问责督导，形成监督机制。定期评估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履行情况，对党委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的情况和领导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的情况进行检查督导，构建完善的奖惩机制、形成科学的考评方法，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由“可做可不做”转为“必须做认真做”，由“被动配合”转为“主动工作”。同时，对抓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不力，履责不力、长期薄弱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

**加大资源投入，保障工作条件**

一段时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客观上存在覆盖不到位、体制不顺畅、经费不充足等问题，表现为“说得多、做得少”“雷声大、雨点小”等现象。新形势下，改进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最根本的在于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地位、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地位、思想政治队伍的主体地位、思想政治工作投入的优先地位，切实加大政策投入、人员投入、经费投入，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条件保障。

一是完善政策投入。政策是重要的战略资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高校的特色，也是优势，事关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的根本问题，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加强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首先要从政策上保障思想政治工作重要地位的落实。高校党委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学校行政工作、事业发展一同规划、一同安排。要在项目设立、评优表彰、升职晋级等方面，加强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等工作的政策扶持，提升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设水平，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二是配齐建强骨干队伍。队伍是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要进一步制定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养培训规划，以“政治强、素质高、品行好、作风正、能力强、有担当”标准选拔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推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制度，凝聚和建设“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的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哲学社会科学教师队伍。将从严治教、依法治教落到实处。在教师职务评审、岗位聘用、评优奖励等环节实行一票否决制。切实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和党务工作队伍纳入人才队伍建设总规划，完善选拔、培养、激励机制，足额配备专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和专职辅导员，使更多师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和主动传播者，不断壮大工作力量。

三是确保必要的经费投入。经费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各级党组织和主管部门要按照中央要求，制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规划，设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经费，在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经费投入、公共资源使用中优先保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建设，并确保随着事业经费的增长逐年增加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投入，提供必要的设施、设备和活动场所，支持和保障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靳诺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不忘初心，担当职责使命

——新的伟大工程之思想建设篇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不忘初心，不改本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思想政治建设为引领，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通过开展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党内学习教育和思想政治建设，带领全体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锤炼党性修养，拧紧思想上的“总开关”，更好地担当时代赋予的职责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

 沈阳南站客运车间党支部在“七一”临近之时，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主题党日活动，他们基于自制的十二期微党课“党员朗读者”开播3个月以来的良好收效，用诵读红色经典的方式来教育引导党员铭记身份、寻迹初心。

参与活动的王刚说：“每名参与的党员都感受到了红色教育的力量，都触及了灵魂深处。”

心中有信仰，脚下才有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铸魂，始终以强基固本、正本清源的标准治心，带领全党在思想、作风、党性上持续进行“补钙”“加油”。

 自2013年以来，中央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内学习教育和思想政治建设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广大党员锤炼了党性修养，拧紧了思想政治上的“总开关”，筑牢了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加强理论武装，筑牢思想之基。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培训，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党校连续举办7期专题研讨班，将省部级干部轮训一遍。各地区各部门利用集中轮训、专题培训、中心组学习等方式，组织广大党员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学习不断引向深入。

“建立党员活动日制度、开展互动式情景式党课”“利用午休、班前班后开展‘微党课’”“利用‘两微一端’组织流动党员网上学习、异地学习”……通过种种创新方法和形式，各地学习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

 锤炼道德品行，引领党风政风。在浙江丽水市松阳县政府的网站上，当地35名县处级领导干部晒出家规，并作出承诺。“晒家风是一种鞭策。”松阳县委书记王峻认为，将家规家训作为一个家庭对社会作出的道德承诺，引导党员干部把家规家训亮出来，自觉接受监督，带头树好家风。

“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党性教育这个核心、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才能解决好广大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引导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从而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江西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黎康说。

**深入推进，思想政治建设驰而不息**

思想是本，行动是形，本正则形立。

2013年下半年开始，自上而下分两批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让党员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严格的党性锻炼。

全国各地各部门积极动员部署，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学习和教育，查摆在“四风”上的问题和“短板”，立行立改、上下联动，以钉钉子精神正风肃纪。

活动历时一年多，给“四风”问题来了个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不少干部更从活动中认识到，党员干部只有接地气才有底气，只有靠真心才能赢得民心。

 严不严，广大群众说了算；实不实，解决实际困难是关键。

 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自觉对照“三严三实”要求，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从群众普遍反映的问题着手，真抓实干，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呈现出一派新风新貌。

既抓思想引导又抓行为规范，聚焦不严不实问题，持续改“四风”转作风：200多个中央单位和省区市列出“为官不为”具体表现，开展专项整治；80多个中央有关单位和省区市制定干部能上能下、领导干部提醒函询诫勉实施办法。

党员干部普遍反映，经过“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淬炼”，党的意识、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的标杆作用更加明显。

“两学一做”贵在真“学”，重在实“做”。

“青年公务员的继续学习该如何规划？”网民“风且住”在“吉林青年之声”客户端上提问后，引来近百条留言讨论。

一年多来，共青团吉林省委积极搭建“吉林青年之声”等一批新媒体阵地，打造多种学习教育平台，在全省青年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中开展“两学一做”主题教育实践。

各地还坚持把“做”落脚到解决问题、岗位奉献上，从基础工作抓起，从基本制度严起，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

面对日渐突出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长沙交警支队开福大队党支部致力于“党建促交管”，创新交通管理理念，想方设法为辖区群众提供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在探索“两学一做”常态化方面，北京西城区提出，在“做”上深化拓展，坚持学做互进、知行合一，从具体问题改起，从具体事情做起；云南昭通则通过实施“乌蒙扶贫先锋行动”，力促党建扶贫“双推进”。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当前，各地区各部门正落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各项举措，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抓常抓细抓长，让常态化制度化的学习教育成为强基固本、锤炼党性、抓好党建的有力支撑。

**不忘初心，牢记人民重托**

思想转变是作风转变的先导，作风转变能透视思想转变。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5月23日的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514起，处理5023人，给予党政纪处分3476人。

五年间，随机选取一个节点，梳理被曝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曝光力度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从“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到“庸懒散”“违反工作纪律”……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查，显示了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的决心。

直抵灵魂的思想建设，不仅让党员干部感受到了切实变化，也进一步提高了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

在江西萍乡市上栗县东源乡小枧村，61岁的村民晏思萍很多年没有和干部同坐过一条板凳。

“和乡干部同点一盏灯，同坐一张桌的情况，还是几十年前在生产队的时候才有过，但是现在搞‘两学一做’，乡镇干部来得越来越勤快，帮大家解决了很多问题。”

坚定的理想追求因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而更加坚定，也因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而更加神圣。

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固本培元、铸魂补钙，涌现出一批先进的典型，奏响了“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凯歌。

连日来，“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的事迹传遍神州大地，他心系群众、为民造福的公仆情怀令人动容。他担当尽责、忘我工作的敬业精神，交出了无愧于时代和历史的成绩单。

廖俊波去世后，与廖俊波素未谋面的政和县铁山镇大红村村民何荣梁，送来了一副题为“悼廖公”的挽联：主政政和四年间，施展才华天地新，光荣梦想不空谈，俊波书记美名扬。

一个好干部在人民心中的分量，烙印人心。

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不忘初心，已成8800多万共产党员的自觉行动。拧紧思想“总开关”，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精神力量所在，是党赢得人民群众信任的根本。

　 （来源：新华网　　作者：记者 姜潇 赖星）

让党员意识回归本位

党员是党的肌体细胞和党的战斗力的源泉，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持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从近年来党员队伍建设的总体情况看，少数党员身份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缺失，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积极、执行党的基本制度不主动、履行党员权利义务不作为的问题甚至还比较突出。以上问题，究其本质，暴露了少数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的虚化淡化弱化：一是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随意性大、工作开展不正常。二是党员教育宽松软，学习一般化、管理人情化、考核形式化。三是发展党员质量不高，标准不严格、程序不规范。四是活动载体上下一般粗、同质化严重，党员作用无法有效发挥，自身价值难以体现。

在西方政治学中，“塔西佗陷阱”通常是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真话变假、好事变坏，落实在党建工作中，如果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出现问题，失去了应有的号召力和感召力，久而久之，党员同样也会对组织产生隔阂，精神懈怠、迷失自我。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让每一名党员在思想和行动上回归本位、找准定位、发挥作用，是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任务，引导广大党员深学、实做、真改，关键就是要把管党治党的责任要求传导到每一个基层党组织，推动基层党建从根子上强起来、硬起来，把党员真正动员起来、凝聚起来。

一是要把从严管理落实到位。以组织设置、人员配备、制度执行、场所建设、基础党务为重点，推动党建规范化向基层党支部延伸；探索积极分子考察推优、发展对象培训推优、组织部门与街道联合谈话考察等形式，推动党员发展精细化向基层党支部延伸；明确常规工作、重点任务项目清单，制定基础党务工作手册，采取组织部门调研指导，离退休干部督促抽查，不同地区、不同层级联合检查、交叉检查等方式，推动考核管理立体化向基层党支部、向全体党员延伸。

二是要把激励保障落实到位。整合系统内、各领域教育培训资源，推动传统教学方式与“互联网+”信息共享方式有机结合，实施党员菜单式点学服务，建立党组织书记、党务干部、全体党员全员轮训体现。加大对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宣传表彰力度，探索将基层党务干部津贴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管理使用好党费，适度提高标准、扩大范围，加大对老党员、困难党员的关爱帮扶力度。构建“党建+X”资源整合平台，为优秀党员提供更加灵活高效的社会化服务，更加便捷优厚的金融保险服务，更加全面具体的就业扶持政策，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是要把正向引导落实到位。强化看齐意识，打造离退休党支部示范点，充分发挥老党员传帮带作用，从党员标识、承诺践诺入手，引导广大党员在学习、工作和服务中主动亮出身份、亮出承诺、亮出业绩，树立形象。立足各领域基层党建实际，分类细化基层党组织工作重点，严格落实党员积分制差别化管理，健全完善党员服务效能评价机制，以党员先进引领社会正能量，激发各领域、各行业党员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与激情。

（来源：求是网　　作者：陆国荣 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组织部）

以廉政文化建设推进依法治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为廉政建设提供了制度支持与保障，而廉政文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二者在国家治理中相得益彰。

　　廉政文化建设，就是以廉政建设和廉政活动为基础，通过调动和发挥文化的功能，将廉政建设的各要素辩证地、发展地、有机地整合起来，对廉政文化进行哲学思考和创造性的构建。它涵盖三个基本范畴，一是从政者修心治身从文化层面获得的精神动力，二是营造知廉耻、懂荣辱、辨善恶、明是非的风清气正的社会生态，三是各从业人员爱岗敬业、廉洁自律、奉公守法的职业文化。

　　廉政文化建设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走法治道路，法治精神是其灵魂；同时，廉政文化建设能够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为法治社会建设奠定文化基石，夯实道德底蕴。

　　廉政文化建设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依法执政理念的巩固和升华。政党之本，以文建之。廉政文化建设对一个政党和政府而言，体现的是一种风范和气派，反映的是其精神品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和德治心得，“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比喻的就是治国者以德行来治理国家时，自然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支持，这是古人对和谐社会的生动描述和追求。我们党自建立以来，始终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以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富强、民主的国家为奋斗目标，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博大的人文情怀，在走过的革命和建设的艰辛历程中，始终把智慧奉献于人民，把力量根植于人民，把感情融会于人民。在新时期，面临新任务和新要求，我们党以树立崇廉尚洁、风清气正的廉政文化生态为目标，不断丰富廉政文化建设理念和内涵；秉持法治精神，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任务。廉政文化可以滋养法治精神，是实现政治清明的基础，有助于增强法治教育的影响力，提高制度的约束力，扩大监督的覆盖面，促进依法执政理念的巩固和升华。

　　廉政文化建设有助于打造一支道德品质高尚、业务素质过硬的政法队伍。为官之德，以文修之。廉政文化建设对一支质洁而内秀的法治队伍而言，体现的是一种品质和情怀。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完成了许多奠基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我国政法队伍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比，政法队伍能力和水平还很不适应，‘追不上、打不赢、说不过、判不明’等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面临着‘本领恐慌’问题。”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至关重要，必须深入细致地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和提升政法队伍的道德品质修养。德者，才之帅也。古人云：“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因此，对于一名称职或优秀的政法工作者而言，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当然，修身养德不是闭门修行，更不是回避现实，而是要把立德、立言、立行统一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具体实践当中。二是加强和提升政法队伍的专业素养。才者，德之资也。目前我国政法队伍的整体专业素养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因此，提升政法队伍的专业水平和能力刻不容缓，要以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精神系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升业务能力，总结实践经验，掌握过硬本领，锻造一支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真正能够胜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任的政法队伍。

　　廉政文化建设是培育和涵养公民法治精神的重要途径。国民之怀，以文聚之。廉政文化建设对国家公民而言，体现的是一种美德和风尚，而公民的法治精神是这种美德和风尚的具体体现，是公民素质的基本要素。法治精神是指追求法治的价值取向以及实现良法善治的理想、信仰和思想原则。法治精神的核心内涵是法律至上和人民当家作主，法治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价值导向。我国探索法治化的道路是艰辛而又曲折的，法治建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薄弱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到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步伐加快，全面依法治国目标更加明晰。总之，公民法治精神的培育和涵养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一个风清气正、生动活泼的社会生态形成和成熟的前提。要通过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等内在的价值评判，将廉政文化建设与法治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让尚德崇法成为现代公民的美德和气质，让法治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实现理念与行动、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屠建学）

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斗争中，确立了在中国各种革命力量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实践中经过比较，自觉地、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这种监督是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更需要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内容是：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的工作和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民主党派的监督，对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健全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十分注意发挥民主人士的监督作用。1941年1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有毛病，也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问毛泽东：中共怎样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和阐述了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思想，并且批评了在对待党外民主人士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等错误倾向，要求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得到了确立。

　　1950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不拔去都没有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的背后联系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就不可藐视。”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年9月，中共八大正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重大贡献。

　　长期共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长期不变，共同存在，着眼于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客观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坚持团结合作的长期性。也就是说，各民主党派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合作中同存在、同呼吸、共命运。

　　互相监督，就是各党派之间互相提意见，作批评，着眼于中共执政的需要，坚持互相监督的必要性。互相监督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共产党可以监督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共产党主动邀请党外人士监督；另一方面，民主党派也应该接受共产党的监督，越是监督，越是能进步。由此可见，互相监督是各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价值所在。只有实行互相监督，才能巩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友好关系。因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一个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完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关系的方针。

　　关于提出和坚持这一方针的原因，毛泽东解释说：“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他还说：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朵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这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又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个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十六字”方针正式确立，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党派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在这种深化和发展中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也创立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当前，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的社会阶层、新利益群体不断出现，社会思想更加多元多样多变，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理论认识更加自觉，实践层面不断革新。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把民主监督作为加强党的外部监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途径，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形势下，伴随着民主党派监督的渠道不断拓展、程序日益规范、形式有所发展，这对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持国家长治久安，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各级党委要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重温毛泽东关于民主党派监督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做好相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邵云峰）

培养学生创造力是高校主要任务

我认为，只有站在巨人肩膀上，才能有所创新。

去年5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科技三会”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创新的方向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只有站在巨人肩膀上，才能有所创新。因此，科学普及的本质之一就是要激发全民创新的热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创新教育。

在整个经济链条中，最前端20%的产品会得到80%的利润，而落后产品的效益很少，这就是长尾效益。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过去曾想通过让出市场换来技术。事实证明，一流技术是买不来的。而且，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普及和技术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我们过去擅长的模仿也没有了空间。所以，要继续高速发展，只有创新这一条路。

实际上，我国已经具备了跳跃式发展的基本条件：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世界上最多的工程师、技术人员梯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师发展摇篮，还有大量的科研投入。

我国的创新能力指数目前排在全世界第19名，前五名是美国、日本、瑞士、韩国和以色列。这5个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共同点是科普能力强。美国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国家利益的关键投资，是赢得未来的第一步，要鼓励创新就要做到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每个人的知识储备都应该是四面体，如工程师除了工程方面的技能，还需要科学、人文和艺术的支撑。所以，一个聪明的人不见得就能创新创造。创新能力不是天生的，是需要后天培养的。培养年轻人创新的素质要从创新教育开始，引导、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素质。

现在的教育，其目的已经不像韩愈在《师说》里讲的“传道授业解惑”。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学校不可能传授所有的知识，所有人都需要终身学习。那么，大学不以传授知识为第一要务，其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培养创新的能力，包括好奇心、激情、思维方式、想象力、联想力、思辩力、坚持的能力，等等。

一个人广泛的知识储备会为未来的创新创造储备能量。大学生也需要不断科普，使自己的知识更广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和科学创新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金涌 中国工程院院士；记者陈欢欢整理）

切实加强立法　维护国歌尊严

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6月22日，国歌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对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国歌标准曲谱的审定、发布和使用，奏唱礼仪规范以及不得奏唱、播放国歌的场合等做出规范，旨在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增强国歌奏唱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此举对于维护国歌的尊严，进一步提升公民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意识，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一经问世就传遍大江南北。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吹响了“誓与国家共存亡”的冲锋号，唤起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气神。今天，战争的硝烟虽已远去，但伟大的民族精神伴着雄壮的旋律仍在传承回响。通过奏唱国歌，我们依然可以跨越时空隔阻，触碰英雄“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奔涌血脉，依然可以感知先辈“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强劲心跳，依然可以听见家国危急之际，“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是国家和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华夏儿女始终赓续的血脉风骨，也正是这份基因的沉淀，让国歌严肃而厚重，成为引领全社会养浩然正气、聚万众之心的重要力量。

　　为国歌立法，是对深藏于中华儿女心灵深处民族情感的认同，也是维护国歌尊严最为有效的方式手段。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法律的约束，少数国人对国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认识不足，现实生活中随意使用国歌，奏唱国歌等问题屡见不鲜，更有甚者，还出现了个别娱乐化国歌的现象。有鉴于此，国家不断加大对国歌的法律保护，继2004年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后，此次将国歌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进一步强调国歌的法律地位，通过对规格、场合、礼仪等问题的统一规范，对各种违法行为给予强有力的纠偏，着力遏止不严肃的国歌奏唱现象和其他有损国歌尊严的行为，引导人们准确认识国歌，正确使用国歌。

　　战争年代，《义勇军进行曲》所表达的是为国牺牲的血性，是抵御侵略的奋起；和平时期，《义勇军进行曲》所唱响的是中国人民不忘初心、励精图治的心声。时至今日，国歌已不仅仅是弘扬爱国主义、传承民族精神的好载体，同时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的好教材。尊崇、爱护国歌，唱好、用好国歌，是爱国主义外化于行的具体表现，也是每个国人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昂扬的旋律伴随着我们走过了烽火岁月，走过了筚路蓝缕，未来还将继续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黄旭）

红色文化与文化自信

一

　　文化自信，就是对于自我文化效能的确认感。大凡行为主体都有一定的文化，也都有预定的行为目标。当一个行为主体求实地认定自身拥有的文化能够保障实现预定目标的时候，它就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文化自信。近年来，我们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说要始终坚信党和人民拥有的文化是先进的，是世间罕有的好东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

　　那么，我们党和人民拥有哪些文化呢？一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列祖列宗留给我们的有益文化；一种是我们党和人民创造的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常我们统称为红色文化。这两种文化虽然不同，但在发挥效能时，却并非彼此孤立的二元存在，而是统一于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社会实践之中的。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经党和人民实践的创造性转化，也就脱胎换骨，变成了红色文化。比如“实事求是”，原本是《汉书》作者班固称赞河间王刘德的话，意思是说刘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辩、严谨扎实，但是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则被作出全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由此，这一词语也就从特指“修学好古”的学风上升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之后，又着意归结强调：“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这样的严谨论述，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文化观。因此，可以说，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对红色文化的自信，或者说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

    二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因而一直以伟岸的身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拥有山海一般的文化自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坚定深沉的自信，我们的先人们才能够以博大的胸襟容纳外来文化，以从容的态度改造外来文化。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至今仍让我们引为自豪的光辉范例。可以说，如果没有先人们的那种文化自信，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就会三分明月少其一。

　　但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趋没落，在文化上也日趋腐朽。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因素。到头来，儒家文化以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终于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上百年的文化危机。危机的根本标志就是丧失文化自信：一是文化自负，即过高估计封建主义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它往往表现为既抱残守缺又妄自尊大。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面对国内变法求新图强的呼声，慈禧太后控制的清廷虽然不得不作出一些赞成变法或实施新政的姿态，但骨子里依然顽固地抱定“纲常名教，亘古为昭”“不易者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二是文化自卑，即过低估计中华传统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由自信转为他信。在这方面，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员。他虽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是又由反封建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甚至公开声明：“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文化自信的丧失，实质上是民族自信的丧失。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继而东北沦陷。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文人、政客居然慌张到六神无主的地步，因此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大公报》发表题为《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断言“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蒋廷黻扬言，“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有蒋介石“国师”之称的戴季陶则联手下野军阀段祺瑞，请九世班禅在杭州灵隐寺举办时轮金刚法会，还振振有词地说：“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 上流社会制造的乌烟瘴气，不可避免地要蔓延开来，泱泱中国弥漫着萎靡不振、手足无措的气氛，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也随之跌入低谷。严峻的事实告诉人们，不打破腐朽的封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不但要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的中断，也势必把整个中华民族推向覆亡的深渊。

　　那么，打破封建专制的力量何在呢？其仍然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早在190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指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老大中国”，即腐朽没落的帝国；一个是“少年中国”，即充满朝气的工业化强国；有两种国民：一种是默认并固守“老大中国”的“老大国民”，一种是憧憬并创造“少年中国”的“少年国民”。“老大中国”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冤业”，“少年中国”则将是由具有少年一样“心力”的国民创造的辉煌。他大声疾呼：要用“少年国民”取代“老大国民”，用“少年中国”取代“老大中国”，让“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让“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934年，鲁迅针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悲观论调，明确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然而，在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世界体系的国际环境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激活、扬厉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唤醒、振作民族精神，必须有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要动员、组织富有民族精神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形成改写历史的伟力，必须有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走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承担起指导、带领亿万人民拯救中国及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一直憧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向往没有城狐社鼠、没有剥削压迫的“乐土”，积淀之深，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愈到近代，中国人民的这种向往便愈加热切。当年康有为的《大同书》不胫而走，就是一个明证。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确立了美好的核心价值观，却未能提供实现这一价值观的正确道路。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会产生久旱逢甘雨、歧路见明灯那样的亲切感和依靠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也是扬厉优秀传统文化、荡涤腐朽传统文化的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崭新精神气质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无比壮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诞生了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文化。历史毋庸置疑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救星，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卓越发扬者，而用红色文化武装起来的中华优秀儿女则是改造中国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任何把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红色文化称为“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回顾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他十分自豪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同上，第1516页）

　　首先是指导思想上的主动。仅以革命时期为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充满辩证精神的民族智慧在革命实践中的融合，孕育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持久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一系列指导性的理论著作。这充分表明，在每一个转折关头，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党都能发现规律、科学决策、成竹在胸，从而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自从诞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就彻底告别了近代历史上没有思想武器可用的窘迫局面，完全摆脱了四顾茫然、不知所之的被动状态。

　　其次是精神状态上的主动。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就把“东亚病夫”“劣等民族”之类的帽子甩到了太平洋中。越是面对艰难和坎坷、风险和挑战，我们党和人民越是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和智慧。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所有这些，都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和衷共济、众志成城，舍生取义、尽忠报国等民族精神的灿烂升华，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上诠释了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光荣。

　　再次是文化斗争上的主动。从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结成“神圣同盟”，在对红色政权进行凶残的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对红色文化进行了空前的文化“围剿”，甚至疯狂屠杀革命的、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然而其结果却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也正是在这一“围剿”中成为文化革命的伟人。这里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红色文化的巨大效能和独特魅力还往往令对手折服。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会上印发了中共延安整风的3个文件，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蒋介石还特别强调，这3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痛定思痛，于1950年开展国民党改造运动。其间，他除再次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参考资料外，还要求国民党干部学习4本书，即《辩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设》和《中共整风运动》。当然，由于党的性质的根本不同，党和人民的红色文化是他们根本学不来的。

　　迄今为止，我们党和人民依靠红色文化打了三场大仗。第一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从而终结了世界近代史上看不起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时代；第二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和物质技术基础，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敬，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第三仗取得并且还在取得改革开放的胜利，短短30多年，中国就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中国人民参与国际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空前增强。

　　试问，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吗？有过如此效能强大、战无不胜的文化吗？没有，从来没有。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创造并且还在创造的红色文化，正在复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就其先进性来说，不仅超越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超越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使得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园中重新焕发出夺人心魄的光彩，它使得中华民族再次以伟岸的身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具有民族感情的中国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对这种文化产生由衷的自信和自豪。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然而，越是接近这一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国际敌对势力越是千方百计地消解我们的红色文化，处心积虑地瓦解我们的文化自信。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较量中，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再一次结成“神圣同盟”。他们或者鼓吹“以儒代马”， 主张重新“将儒教立为国教”，或者鼓吹“全盘西化”，企图用西方的“宪政民主”颠覆我们的人民民主，用新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生产关系，用“普世价值”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着眼实现民族复兴的远大目标，正是出于对当前文化态势的深刻洞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才一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再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再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再强调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树立起坚定的文化自信。这些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用心之良苦，寄托之深远。

　　文化自信并非行为主体对于自身的文化实力和文化效能的机械反映。也就是说，不是拥有雄厚的文化就一定能够产生文化自信。楚厉王和楚武王都曾亲睹并可能拥有荆山之玉，无奈其识见鄙陋，反而将其认作普通的石头。可见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觉。这里所说的文化自觉，就是能在纷纭缭乱的文化现象中，把握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普遍联系和发展规律，从而对它的效能和前途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是一种科学的理性，它恰如巨大的羽翼，托载我们上升到一个居高望远的境界。一旦进入这个境界，我们就会看到平日貌似庞然大物的资本主义文化其实并不足观，就会在浮云笼罩的时候看到即将普照的灿烂阳光，就会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看到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光明前景。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国际战略学者约瑟夫·奈陆续发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软实力》《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等著作和文章，不断阐发他的软实力理论。在他看来，自冷战结束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跨国公司林立世界。生产的一体化、工艺的扩展等等都在表明：传统的暴力、财富手段正在逐渐失灵，权力正在由资本密集型向信息密集型转移。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支配了国际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总之，在当今和未来，国际的较量主要在文化领域进行。应当说，这个理论尽管漏洞不少，但毕竟勾勒出了国际竞争重点转移的大趋势。这是我们必须借鉴的。

　　约瑟夫·奈是一个政客出身的学者，他研究软实力理论的目的在于保持并强化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但是资本的逻辑并不以约瑟夫·奈的意志为转移。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国际资本以为天下已定，又变得无法无天起来。国际资本对于劳动大众和发展中国家的贪婪榨取和疯狂掠夺，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一次弄到激烈对抗的地步，从而在2008年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资本主义文化的软实力也随之迅速滑落。对于资本主义的极度失望，必然催生对于社会主义的热情向往，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投向中国的文化。在遍及欧美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中，被剥夺者们举起了“天下为公”的旗帜。种种事实表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面临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大好机遇。

　　民族复兴，归根结底，体现为文化的复兴。我们应当不忘初心、不负使命，抓住机遇、锐意进取，不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推动红色文化的发展繁荣。让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充满民族智慧的红色文化在指导实践、推动发展中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让我国的国际示范作用越来越大，国际威望越来越高……到了我国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和社会全面发展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我国在化解国际社会各种矛盾、保障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方面成为榜样并发挥引导作用的时候，我国因为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而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拥护的时候，我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世界人民所普遍倾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豪地宣告：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复兴。

（来源：《红旗文稿》2017/12　　作者：刘润为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教师对讲台要有敬畏意识

学校教育是现代社会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教师是人才培养的主力军，而课堂教学则是学校教育的主渠道和学生成长成才的中心环节。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全在教师。教师如何认识和对待讲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所学校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承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广大教师要敬畏讲台、珍惜讲台、热爱讲台，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课堂教学中去，认认真真讲好每一堂课。这些对教师队伍提出的明确要求，应当成为广大教师的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

 敬畏讲台，就是敬畏职责。人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源泉。古往今来，人才首先成长于学校，所以“教育强则国家强”。教师是离学生最近的人，教室是师生心贴心的殿堂。在教师的双肩上，一边是学生，一边是国家。教师的课堂劳动，功在学生，利在国家。讲台的神圣性在于“课堂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教师不能“我的地盘我做主”，把教室当成自己的“私人文化作坊”。学校教育是一种社会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教育目的。我们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校，学校教育必须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教师作为国家人才工程的一线实施者，必须自觉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用党的远大理想、国家的宏伟目标激励学生的成才动力、引导学生的成才目标、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引领学生的成长路径、培养学生的价值情怀，使他们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师对学生的任何误导，都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失责。

     敬畏讲台，就是敬畏人才。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尊师重教传统，有特色鲜明而内涵独到的师生观。在学生心中，老师是自己的知识父母；在教师心目中，学生是自己学缘至亲，敬畏学生、服务学生、引导学生、托举学生应成为教师思维的轴线，他们以可敬的“蜡烛精神”——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在中国的教师看来，后生可畏，学生无论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还是研究生，对于教师而言，都是知识理论上的“未成年人”，他们的可塑性决定了教师工作的严肃性，教师的工作作为“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教师对人一槌一刀的雕塑，都应当出神入化，让人性愈加光彩，否则，误人一时一念，可能就误人一生一世。因此，教师必须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学生负责，既传授做事之理，又传授做人之理，做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学生潜力的无可限量决定了教师对学生的无限期待，教师们应时刻提醒自己：在你的教鞭下可能出牛顿，出爱因斯坦，出屠呦呦，人才的培养容不得有丝毫懈怠和哪怕偶然的疏忽。为此，教师应当甘愿成为学生前进道路上的铺路石，攀登知识高峰的人梯，虽然“给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可教师应当是那种哪怕自己只有半碗水也要全部倒给学生的人。教师像父母盼望着孩子超过自己一样，努力让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且十分坦然自豪地认识和对待这种超越，在教师的自我评估中，他们真切地懂得，“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敬畏讲台，就是敬畏科学。习近平总书记说：“教师工作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工作。”传播科学必须要敬畏科学。科学是人类的智者们用心血、汗水和智慧堆起的圣山，它是开启心智的锁钥、照亮心灵的火把，也是人们改造自然、建设社会、养润心性的依靠。课堂是知识的圣殿、思想的圣殿、真理的圣殿，容不得有任何非科学、伪科学、反科学的存在，这就要求教师对科学必须怀有谦恭严谨的科学态度，对科学理论做到精准圆融的系统把握。教师只有自己先成为专家才能讲出蕴含深奥道理的家常话，才能把基本原理变成管用方法传授给学生。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大家才能培养出站在自己肩膀上的巨人。传播科学容不得有丝毫错误。科学探索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人类的认识也是一个由浅入深、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但科学的大厦是在剔除错误中矗立起来的，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说普通社会成员的知识错误可能影响本人和少数人，那么，教师课堂上的错误则具有快速放大效应，可谓谬种误传，贻害众人。传播科学来不得半点虚浮。教师只有敬畏科学、淡泊名利、遵从真理，才能培养出学生以超然的态度献身真理的科学精神。

     敬畏讲台，说到底是敬畏教学。教学绝不是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单向信道，而是师生亲切交流的场所。教学不能完全脱离知识灌输，学习也不可能没有艰苦的努力，正是因为教与学的艰巨性，才要求教师有举重若轻的能力。教学是知识体系的构建，但教师手下的理论大厦必须是精美的艺术形式。准确阐述知识是教学的基本要求，科学的艺术化表达是传授知识的高境界。因为艺术是人们接受新生事物的快乐有趣的形式，可以把学生的热情激发出来。教学有知识的灌输，更应该是能力升华。任何理论都不能成为社会实践的施工图，而应该是引导人们社会行动的路线图，确保人们始终行进在正确道路上，或至少尽可能少走弯路、不走歧途。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此，教师不能成为知识的搬运工，更不能成为攀登者背囊的不断施重者，而应当是学生探索未知世界的引路人，科学方法的升华者。教学过程开始于解惑，也应该发展到新的起点上的反思生疑。美国教育家布鲁巴克说过：“最精湛的教学艺术，遵循的最高准则就是让学生提问题。”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因此，教学应当成为信息场中师生之间的心语，从而使师生心心相印。这就要求教师能读懂学生的表情、呼应求知者的心声，不仅具有把学生从一个知识高地带向另一个高地的能力，而且具有感染他们自主学习、完善人格和不断提高攀登理论和道义高峰的能力。

     （来源：《红旗文稿》2017/12　　作者：何畏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